

## 卦兆之辭曰“繇”之原因及相關問題探析




周 玉 秀\*

<目次>

- |           |            |
|-----------|------------|
| I. 釋“繇”   | III. 繇辭與籀讀 |
| II. 繇辭的生成 | IV. 餘 論    |

先秦文獻中將筮書之卦爻辭及卜書之兆辭稱作“繇”，《國語》《左傳》中有不少實例，歷代學人對其原因有不同解釋。本人不揣淺昧，試作梳理，以就正於有道之家。

### I. 釋“繇”

《說文》曰：“繇，隨從也。”段玉裁增補其或體為“由”。云：“繇之訛體作繇。”<sup>1)</sup>“繇”字在西周中晚期的金文中常見，如西周中期的景伯簋作，晚期的師袁簋作，散氏盤作等<sup>2)</sup>。吳大澂《字說》曰：“疑古文譌繇為一字……謠譌之謠，古皆作繇。”<sup>3)</sup>楊樹達曰：“繇為嘆詞。”<sup>4)</sup>季旭昇先生《說文新證》謂繇字本義是“歌謠、卜之文辭……《說文》釋為‘隨從’，當為‘遯’字之假

\* 嶺南大學校 中國言語文化學部 助教授。

1)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43頁。

2) 高明編著，《古文字類編》(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998頁。

3) 戴家祥主編，《金文大字典》，學林出版社，1995，4372頁引。

4) 同上，4373頁引。

借。”<sup>5)</sup>然而，春秋文獻中，歌謠字作“謠”，“繇”則指占筮之辭。如《左傳》僖公五年曰：

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sup>6)</sup>

“童謠”之謠不作“繇”；《詩經》裏就有“我歌且謠”等，也不作“繇”。又僖公四年曰：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羸。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sup>7)</sup>

杜預注：“繇，卜兆辭。”《國語·晉語四》：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強，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sup>8)</sup>

5) 季旭昇，《說文新證》(下冊)，藝文印書館，2004，215頁。

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310-311頁。

7) 阮元校刻本，《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1793頁。

8)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340-342頁。

韋昭注：“繇，卦辭也。”卜辭卦辭之“繇”亦不作“謠”。可見當時二字分用，這種情形不可能是漢儒所改之結果。

那麼，為什麼卜筮之辭稱為“繇”呢？

《說文》曰：“籀，讀書也。《春秋傳》曰卜籀。”徐鍇《繫傳》曰：“諷誦書也，卜籀謂讀卦爻詞也。”<sup>9)</sup> 段玉裁注曰：“言部曰：讀，籀書也。敘曰：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試字句絕，諷籀連文，謂諷誦而抽繹之。滿九千字皆得六書之指，乃得為吏也。此籀字之本義，經傳勉用。周宣王時大史以為名，因以名所著大篆曰籀文，迄今學者絕少知其本義者，故於讀下‘籀書’改為‘誦書’……亦借繇字為之，《春秋傳》卜筮繇辭今皆作繇，又俗作繇。據許則作籀。”<sup>10)</sup> 《說文》：“讀，誦書也。”段玉裁改“誦”為“籀”，云：“籀，各本作誦，此淺人改也。今正。《竹部》曰：‘籀，讀書也。’讀與籀疊韻而互訓。《鄘風》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蓋籀抽古通用。……諷誦亦可云讀，而讀之義不止於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辭，而讀乃得其意蘊。自以‘誦書’改‘籀書’而讀書者勉矣。”<sup>11)</sup>

段氏注的基本意思是，籀讀可以互訓，籀的詞義與抽同源；讀的詞義範圍大於誦，所以不能以“誦書”解釋“讀”。

對段氏的改作，學者有贊同的，也有反對的。如王筠《說文句讀》曰：“段氏據《竹部》‘籀，讀書也’改誦為籀，是也。”<sup>12)</sup> 徐承慶《說文段注匡謬》曰：“段氏注內詳言讀字之義最為明通，學者可瞭然於古之訓詁而得讀書之法。至謂淺人改籀書為誦書，殊未必然。……段云抽繹其義蘊為讀，斷其章句為讀，擬其音曰讀，易其字以釋其義曰讀，人所誦習曰讀。謂諷誦亦為讀，而讀之義不止於諷誦。然必諷誦而後抽繹義蘊，而後能斷其章句，擬其音，知其字之當易以釋其義，則訓為誦書，其詞渾括，古人之文簡而要也。《鄘風》‘不可讀也’非諷誦之謂，故毛傳云‘讀，抽也’。所謂義各有當，籀訓讀書，籀抽古

9)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中華書局影印清道光年間祈禱藻刻本，1987，86頁。

10) 《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90頁。

11) 同上，90-91頁。

12) 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1988，2914頁。

通用。而卜筮之辭曰籒，不得以讀解之，未可主讀籒互訓之論輕易本文。”<sup>13)</sup>

今按，籒讀抽三詞同源，籒，《廣韻》直祐切，上古音爲定母幽部；抽，醜鳩切，上古透母幽部；讀，徒谷切，上古定母屋部<sup>14)</sup>。三字聲紐基本相同，讀與籒抽韻部也十分相近。所以三字同源互訓是沒有問題的。但許慎採用“籒，讀書”、“讀，誦書”的遞訓方式，一定是有其道理的，誠不能輕易改動。

高亨先生曰：

筮書之卦爻辭及卜書之兆辭所以稱“繇”者，何哉？考《說文》云：“籒，讀書也。從竹，籒聲。《春秋傳》曰‘卜籒’。”許氏所引之“卜籒”，即《左傳》之卜繇，據此，卜書之繇借爲籒，推之筮書之繇，亦借爲籒，並以其辭須誦讀，因謂之籒耳。此一說也。近儒以爲繇借爲謠。《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謠，古字作魯。《說文》：“魯，徒歌。從言，肉聲。”因筮書之卦爻辭及卜書之兆辭，大抵爲簡短之韻語，有似歌謠，故謂之謠。此又一說也。亨謂後說是也。考筮書之繇，古亦謂之“頌”。《周禮·大卜》云：“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注：“頌，謂繇也。”此卜書兆辭稱“頌”之證。又《占人》云：“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所謂“八頌”，孫詒讓謂“頌是筮辭之名”（《周禮正義》）甚是。此筮書卦、爻辭稱“頌”之證。此兩者所以稱爲頌，孫詒讓謂“其文皆爲韻語，與詩相類，故亦謂之頌。”其說至確。兆辭與筮辭，因其與詩相類而稱爲頌，以此類推，自是因其與歌相類而稱爲謠，此亦繇借爲謠之旁證也。<sup>15)</sup>

高先生確認兆辭筮辭因與歌相類而稱爲繇，繇爲“謠”之借字。但是，占兆辭、卦爻辭不一定是韻語，即如高先生文中所引，也不是都押韻，《國語·晉語》所言之繇“利建侯行師”就不是韻語。而且，我們前面已說過，春秋文獻中二字並不通用。看來，問題並不是這麼簡單，還需要從其他方面做深入探討。

13) 引自《說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1988，2913-2914頁。

14) 本文上古音採用曾運乾先生古音十九紐及古韻三十部說，參郭晉稀先生整理的《音韻學講義》，中華書局，1996。

15)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中華書局，1984，16-17頁。

## II. 繇辭的生成

《周禮·春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玄注：“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鬯、曰蠱、曰克。”賈公彥疏曰：“云體者，謂龜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體。云經兆之體，名體為經也。云皆百有二十者，三代皆同，百有二十，若經卦皆八然也。若然，龜兆有五，而為百二十者，則兆別分為二十四分。云其頌千有二百者，每體十繇，故千二百也。”<sup>16)</sup>又《占人》云：“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眡之吉凶。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玄注曰：“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云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sup>17)</sup>其中所謂“八頌”也是繇辭。鄭云：“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也。”<sup>18)</sup>孫詒讓曰：“《大卜·三兆》云‘其頌皆千有二百’注云：‘頌謂繇也。’是頌為龜占之辭，但卜用《三兆》，不得有八頌，明此是假頌為筮辭之名，以其大事卜筮相兼。又《三易》爻辭亦為韻語，故通得頌名也。”<sup>19)</sup>這說明，周代筮卜之占辭有現成的，而且每兆都有不同的繇辭。也就是說，並不是占卜時由卜人臨時創造卦兆之辭，而是根據卦體來選擇卦辭。這種情形古人也注意到了，如上文所引《左傳》僖公四年之繇，孔穎達疏曰：“筮卦之辭亦名為繇，但此是卜人之言，知是卜兆辭也。卜人舉此辭以止公，則兆頌舊有此辭，非卜人始為之也。卜人言其辭而不言其意，不知得何兆，此義何所出也。”<sup>20)</sup>

16) 《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802頁。

17) 同上，805頁。

18) 同上。

19) 孫詒讓，《周禮正義》，中華書局，1987，1960頁。

20) 同上，1793頁。

又襄公十年：“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于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丘。”杜預注：“繇，兆辭。”孔穎達疏：“是言灼龜得兆，其兆各有繇辭，即下三句是也。此傳唯言兆有此辭，不知卜得何兆，但知舊有此辭，故卜者得據以答姜耳。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此繇辭皆韻，古人讀‘雄’與‘陵’為韻，《詩·無羊》《正月》皆以‘雄’韻‘蒸’韻‘陵’，是其事也。”<sup>21)</sup>孔穎達認為這兩處都是“兆頌舊有此辭”的，而且“其千有二百皆此類也”。可見周人所據之繇辭已非常豐富。

那麼，這種舊有的頌辭又是怎樣形成並以何種形式存在的呢？

董作賓先生《商代龜卜之推測》一文，根據甲骨文的形制和內容，詳細地研究了商代龜卜的情形，認為“商人契于龜版者，多為命龜之辭，及貞卜之事。此與周以後大異。《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注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龜也’。鄭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無論如杜說為書占於帛，如鄭說為書事於策，皆可知周人卜辭非逕刻之於龜也。”<sup>22)</sup>又說：“周時龜卜之法已極繁複，而兆豐之辨識，尤非易事。……余方擬廣徵兆豐及卜辭之完整者，參互比勘以求其制，因材料甚少，尚未整理。則審兆坼，判吉凶之研究，惟有俟諸異日耳。”<sup>23)</sup>董先生雖如此說，但其研究已明確告訴我們，占卜之日所作主要是命龜之辭，即想占卜的事情及希望得到的結果。夏含夷研究周原卜辭，也得出過相似結論：“周原卜辭的性質就像東周貞卜之性質一般，是卜人向鬼神表示‘心所希望’。”<sup>24)</sup>他後來強調說：“最近二十年以來，戰國楚簡的卜筮紀錄陸續出土，提供很多新的資料說明這一結論一點兒也不錯。”<sup>25)</sup>

21) 《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1948頁。

22) 董作賓，《董作賓先生全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第三冊 864頁。

23) 同上，861頁。

24) 夏含夷，《古史異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8頁。

25) 夏含夷，《再論周原卜辭凶字與周代卜筮性質諸問題》，臺灣中文大學簡帛學國際

由此可見，占筮辭的第一項內容是命辭，有了命辭，讓占筮者明白所要問的事情及希望的結果。然後灼龜占卜或以筮法成卦，再觀察龜兆或卦象，以判斷吉凶。早期的占筮可能依據龜兆和卦象只作出吉與不吉的判斷，不一定有顯示占驗的繇辭。繇辭可能是事情結束後補寫上去的；也可能有事先寫一些能顯示希望得到結果的辭語，占卜完以後用來宣讀。這種占辭積累多了，編輯在一起，就可以作為占卜時用的現成繇頌。春秋早期，《周易》肯定已經編成，其他的占卜書也應該有，像《連山》《歸藏》之類。所以有現成的繇辭。我們再分析一下前文《國語·晉語四》中的例子：“尚有晉國”就是命辭，意思是“希望能有晉國”。筮占的結果是得了“貞《屯》、悔《豫》”，韋昭注：“內曰貞，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為也。”<sup>26)</sup>得此兩卦後，“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韋昭注以為是筮人“以《連山》《歸藏》占此兩卦，皆言不吉。”但是，司空季子用《周易》的現成爻辭重新做了解釋，結果就完全不同了。今本《周易·屯》卦卦辭及初九爻辭均有“利建侯”，《豫》卦卦辭曰：“利建侯行師。”司空季子所引繇也正是《周易·屯》卦卦辭。《國語》中雖然沒有說出三易之《連山》《歸藏》的繇辭，但據司空季子用《周易》卦爻辭的情形推測，筮史也應該看到了同類性質的詞語。《晉書·束皙傳》云：“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相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sup>27)</sup>廖群認為“這部《易繇陰陽卦》很可能就是《連山》《歸藏》之屬”<sup>28)</sup>，既云“繇辭則異”，則其有繇辭無疑。

陳偉先生研究包山楚簡反映的卜筮制度，所用材料和得出的結論也大致相同。他說，在包山楚簡的“卜筮辭之後，絕大多數簡書還都附有‘祝’辭。這是

論壇論文，2007年11月10日。

26)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340頁。

27) 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1974，第5冊 1432頁。

28) 廖群《筮人“掌三易”及《周易》在先秦的傳播》，載《周易研究》5，2006。

因為占辭中含有凶咎，需要‘以其故祝之’，求得平安。有的祝辭中有‘同祝’、‘共(上從車)祝’和‘移祝’的說法。”卜筮簡的格式，一般由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由通常所說的前辭、命辭和占辭組成，與商周卜辭大致相當。後一部分不見於商周卜辭，並且可有可無(如簡234~235)，可同、可共、可移，屬於相對獨立的部分……對後一部分包含的兩層意思，最好依簡文稱為祝辭和占辭。為了與前一部分中的占辭相區別，後一部分中的占辭似可叫作‘後占辭’或‘再占辭’。”而且，“從簡209~211‘三歲無咎’的記述來看，有的占辭會涉及三年的事情。為了‘記其占之中否’，有必要把卜筮簡保存三年。”<sup>29)</sup> 看來占驗辭就是這樣積累起來的，《周易》的卦爻辭也應當是這樣積累的，只是成了經書之後，就不再被改動了。

我們再進一步探討一下“後占辭”之類的來源。

首先，專職的卜人、筮人或筮史肯定要作占驗辭，尤其是年終“計其占之中否”時，根據應驗的實際情形創造一些繇辭；此外，參與占卜的貴族階層的人物，也會根據情形來創造。分析一下《左傳》哀公九年的例子，就可以說明這一點：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 $\text{䷊}$ 之《需》 $\text{䷄}$ ，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sup>30)</sup>

史龜所說“是謂沈陽”至“不利子商”四句，楊伯峻注曰：“四語疑卜書之辭，陽、兵、姜、商為韻，古音同在陽唐部。”<sup>31)</sup> 楊先生認為“伐齊則可，敵宋不

29) 上所引均見陳偉《試論包山楚簡所見的卜筮制度》，《江漢考古》1，1996。

30)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1652-1654頁。

3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1653頁。

吉”兩句是斷語。但他對史趙所言沒有說明是否為卜書之辭。其實仔細分析，它和史龜之言性質相同，行文格式也大致一樣，起首有“是謂”，接着為四句對偶押韻的詩句，游、救古音皆幽部字。“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也是史趙的斷語。但“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顯然是針對救鄭這件事的，應當為史趙之前所作，或者是他根據當時的形勢需要臨時創作的。當然，史龜所言也有這種可能性。至於陽虎以《周易》筮之，所言無疑是他自己根據《周易》爻辭所做的解釋了。《周易·泰》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這次事情是宋國伐鄭，宋為殷商之後，與鄭有婚姻關係，所以陽虎作如是解。此則實例可以說明兆筮辭有引用的也有現作的。

在造繇辭的時候，有時會引用民謠或俗語，這是卜筮兆辭的一個重要來源。《周易》卦爻辭中有不少民謠俗語，就是積累過程中的創造和輯錄。如《屯》卦爻辭：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從中可以整理出具有民歌性質的詩來：

屯如，遭如；乘馬班如。  
匪寇，婚媾。  
乘馬班如，求婚媾，屯其膏。  
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對於這首民歌的內容，學界有兩種認識：一是“搶婚說”：詩歌描寫的是原始社會男子搶娶女子的情形。周嘯天先生說：“《屯》卦爻辭引的歌謠，其生活內容當是原始部落‘搶婚’的古老風俗。”<sup>32)</sup> 高亨先生說：“今人謂此寫古代掠婚之事，殆是歟。”<sup>33)</sup> 二是“婚禮說”：詩歌描寫的是從男方求婚到娶女的

過程。黃玉順認為，“屯如遭如，乘馬班如”，“描寫來求婚媾的車馬的情態，造成懸念”；“匪寇，婚媾”，“交待車馬的來由，點明主題”；“乘馬班如，求婚媾”，用反復手法，為民歌常用；“屯其膏”，介紹求婚的聘禮；“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描寫女子哭婚的情景”<sup>34</sup>。其實，二說可以溝通，大致禮皆源自俗，“搶婚”是俗，但到了文明時代，“哭婚”即為禮。從詩描寫的情景看，當是文明社會的婚禮，並非搶婚的事實。然而，與禮俗有關的歌謠一般起源都很早，經口耳相傳到最後寫定，要經歷很長的時間。所以，這首歌謠肯定先于《周易》而存在，可以顯示《周易》作者的採納情況。又如《賁》卦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也是同類性質。《大過》卦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明夷》卦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中孚》卦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等等，都是很有韻味的詩歌。

李鏡池先生曰：

卦、爻辭，本來是編纂而成的；但這些詩歌式的句子，我們不能不說是有個作者在。前人把它歸之于兩位聖人的主名之下，說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我們知道那不過是一種偶像的崇拜，不過是一種“箭垛式”的把戲。然而這種傳說卻暗示我們一個意思，就是卦、爻辭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作者。這個作者，我以為即編纂卦、爻辭的那一位。這位編纂者，一方面是編輯舊有的筮辭，一方面是有意為文。你看他不用“何咎”（《隨·九四》、《睽·六五》二處用）而用“何其咎”，以與“復自道”作整齊的句法；“枯楊生稊”與“枯楊生華”互相對照；“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及“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成對偶之文；《漸卦》諸爻辭，整套為韻文，而以“鴻漸于”起，簡直就是《詩經》中的詩句格式。在以記敘為主的筮辭中而有這類詩歌句子，我們很可以看出卦、爻辭編纂者的著作痕跡，亦可以看出編纂卦、爻辭時的藝術背景。卦、爻辭的編著者之所以能寫成這樣的詩歌，喜歡運用這樣的韻文，一定不是他個

32) 趙義山、李修生主編，《中國分體文學史·詩歌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頁引。

33)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中華書局，1984，170頁。

34) 黃玉順，《易經古歌考釋》，巴蜀書社，1995，20-21頁。

人能夠這樣特創。《詩經》的“雅”、“頌”中，很有些是西周初葉的作品，那時候的詩歌，是在一個頗為流行、極力發展的時代。卦、爻辭的編纂者，就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之中，受詩歌的影響，作成同樣的文章。<sup>35)</sup>

李先生的觀點是符合事實的，不過有些詩歌恐怕也傳播有自，這位《周易》的編纂者直接採納而已。

以上分析說明，繇辭的來源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採納民謠諺語；二是卜筮者的創造。不論哪一種，都是長期累積的結果，而不是一時一人之作。

### III. 繇辭與籥讀

繇辭，不論是採納還是創作的，我們能看到的都是用文字記錄下來的。那麼，在無文字或文字較少的時代，有沒有卜辭？如果有，它又是如何存在的呢？當然只能靠口傳了。而且，作為占卜的材料，傳播它的人應當都是貴族階層的或者是專業的，也就是說，都是文化人，是早期的精英人物，有創造和取捨的能力。其傳播過程則又與師授和占卜儀式分不開，而師授也和儀式有關，師授的過程也就是老師教弟子如何占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創作占辭並如何將它形諸聽者，是很重要的事情，這些活動留下的印跡就是“籥”、“讀”、“諷”、“誦”一類的詞，它們是特定儀式中不可或缺的程序。

在上古的各種儀式中，常常是歌、樂、舞三位一體，相輔相成。歌是配樂唱，其唱詞就是詩；樂指樂曲；舞是伴此樂曲而跳的舞蹈。但是，有些儀式中除了歌舞，還需要諷誦籥讀；有些儀式中可能沒有歌舞，却需要有諷誦或籥讀。因此，在早期的貴族教育中，歌、樂、舞、誦是同等重要的。《墨子·公孟篇》曰：“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sup>36)</sup> 《詩經·鄭風·子衿》毛

35) 李鏡池，《周易探源》，中華書局，1978，49頁。

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sup>37)</sup> 這都說明“誦”是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伏俊璉先生對先秦時期的“誦”做過深入研究，指出：“先秦的誦可大致分為行人之誦、瞽史之誦和經師之誦。”“數術家源于史官，而數術類作品大量使用韻文，這就充分證明史家之‘讀書’具有唱誦的性質。”“在各種儀式上，‘讀書’是史職的核心。‘讀’就是‘誦’。史與瞽矇雖為不同的官職，但在‘讀書’、‘誦史’這一點上是相同的。”<sup>38)</sup> 伏文沒有進一步論及“籀”的問題，我們可以做一些補充。

首先，“籀讀”和“諷誦”是有區別的：《周禮·春官·大司樂》曰：“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鄭玄注：“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sup>39)</sup> “以聲節之”，是指聲音要抑揚頓挫，具有節奏感。背文的時候聲音抑揚頓挫就是誦，故《說文》曰“誦，諷也”，後世稱作“背誦”。《國語·周語上》：“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矇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sup>40)</sup> 正因為誦是背文，所以瞽矇之人可以為之。《周禮·春官·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鄭玄注：“諷誦詩，謂闇讀之，不依詠也……杜子春云：‘帝讀為定，其字為奠，書亦或為奠。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並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賈公彥疏曰：“背文與以聲節之，皆是闇讀之，不依琴瑟而詠也。直背文闇讀之而已。”<sup>41)</sup> 所謂“闇讀”，就是背文，是不看原文，通過記憶吟誦出來。

“讀”則側重在出聲，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宣讀”。《說文》云“誦書”，是用近義詞作解。因為“籀”字少見，若二字互訓，不能達到解釋的目的，只好求變

36) 孫詒讓《墨子閒詁》，中華書局，2001，456頁。

37)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345頁。

38) 所引均見伏俊璉《談先秦時期的“誦”》，《孔子研究》3，2003。

39)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787頁。

40)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11-12頁。

41)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797頁。

通如此。“讀”與“誦”的相同點是出聲，不同點是“讀”不必“背文”，語調方面也不一定要求抑揚頓挫；“誦”則必須是“背文”，而且要“以聲節之”。“讀”的儀式一般都在比較嚴肅正式的場合，如《周禮·春官·大史》：“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喪，執法以泣勸防；遣之日，讀誄。”《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sup>42)</sup>《儀禮·既夕禮》：“主人之史請讀賵。”“讀遣，卒，命哭。”《聘禮》：“史讀書展幣，宰執事告備於君。”“史讀書，司馬執策，立於其後。”這些用例中的“讀”都指宣讀。主“誦”的是瞽矇，主“讀”的是史官。“讀”的內容常常帶有禮法性質或規定性，不能出差錯，而且應當要求語調嚴肅莊重。如上所引“讀誄”、“讀禮法”、“讀賵”、“讀遣”及讀聘問禮單等，都是很嚴肅的事情，絕對不能出差錯。《儀禮·聘禮》：“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鄭玄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受其意，既出享，賓出而讀之。讀之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主國君也。人，內史也。”<sup>43)</sup>這說明讀聘問之書信也必須要“審悉”的。同時，由於古人書寫沒有標點，讀的時候一定要準確把握文中、句中的停頓及相應的語氣，這應當是對“讀”的基本要求。把握“讀”的這種詞義特點，對解讀古籍很有意義。比如《詩經·牆有茨》之“不可讀也”之“讀”就是“公開地大聲地說出來”或“宣講”之義，詩中的意思是說，因為事情太醜惡，所以不能宣講。進而言之，對準確理解古籍中含蘊的儀式也是有幫助的。



其次，“籀”與“讀”相同。“籀書”就是“讀書”，史官之職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讀書，“史籀”就是“史讀”。《漢書·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僮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又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sup>44)</sup>許慎《說文解字敘》云：“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尉律：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

42) 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影印，1980，817、818頁。

43) 同上，1072頁。

44)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1721頁。

體試之。”<sup>45)</sup> 二人對史籀的理解不同，許書引尉律多一“籀”字，又有“八體”與“六體”之別。我們前文對史職的分析可以證明班固的理解比較準確，“史籀”不是宣王太史之名。我們雖然很難斷定漢尉律原文作何，但可以肯定許書之“籀”與“諷”並列，均是動詞，“諷籀書”可理解為諷書、籀書，因為《說文解字敘》前面講“八體”，第一種就是大篆，而後文云“又以八體試之”，故知“籀書”不可能指“宣王太史籀”所著大篆。諷書籀書是背誦與朗讀問題，以八體試之是書寫問題。徐鍇釋“卜籀”為“讀卦爻詞”；《漢書·文帝紀》：“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李奇注：“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顏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sup>46)</sup> 他們將“籀”都解為“讀”，是準確的。二字上古的語音關係我們已經分析過了，它們在韻部方面的細微差異可能是方音問題。

西周金文和春秋以前傳世文獻中目前還沒有發現“籀”字，但從《說文解字》“《春秋傳》曰卜籀”看，似乎原作“籀”而後人改為“繇”，有這種可能性，但出土文獻中也用“繇”字，如戰國楚簡《葛陵》簡甲三31：“其繇曰：是日未兌，大言絕絕，口言惛惛，若組若結。”<sup>47)</sup> 字形作、等。《逸周書·嘗麥》中有“乃北嚮，繇書於兩楹之間”一句，也未用“籀”字。所以，“繇”應當是本字，“籀”是後出字，其意義皆源於“讀”。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卜筮之辭稱為“繇”，是因為它要由占卜者(主要是史官)來讀，“讀”本為動詞，引申之，則所讀內容也稱“讀”，因卜筮之辭的特殊性，而以“繇”字專表之。後來又造“籀”字，專指史官教學僮之書。“籀”字產生以後，與“繇”可能混用過。但隨着歷史的演進，它們都成了陳跡，只有意義最廣泛的“讀”沿用下來了。

45) 《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315頁。

46) 所引原文及注分別見《漢書》，中華書局，1962，106、107頁。

47) 轉引自季旭昇《說文新證》(下冊)，藝文印書館，2004，215頁。

## IV. 餘論

占卜中可供觀看的是兆璽和卦象，可以宣讀的是“繇”。但是，這種用來宣讀的繇辭，一定是卜筮辭積累到一定程度，編纂成書或用文字寫出來的時候才有此稱的。其多押韻，具有詩歌語言的特點，則與最初的傳播方式有關，也就是口傳時爲了便於記憶，而多以韻文形式。這種形式傳播時間長了，也就有了正統性，所以後世的算卦占卜辭仍多爲詩體，而且宗教活動中一般都有誦經的儀式。然而，“誦經”和“讀繇”是兩種儀式，“誦經”是師授過程中的儀式，是傳播是學習，當然還孕育着創造；“讀繇”則是占卜中的儀式，是實踐是應用。至於這種儀式在上古到底是什麼樣子，有哪些必要因素？還需要深入探討，這對我們準確把握一些概念的含義，理解先民的思想感情，是很重要的。比如《說文》“籀”字從“攴”得聲，“攴”即“抽”字，而古人常常解“籀”爲“抽”，是不是意味着上古的“繇”也是寫在簡策或“簽”上，需要抽取而讀之呢？依《周禮·大卜》“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之說，每卦或占兆應不止一種兆辭，筮占一次可能會抽取其中之一，如後世抽籤占卜之法。這都是需要進一步探析的。

## &lt;參考文獻&gt;

-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高明編著，《古文字類編》(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戴家祥主編，《金文大字典》，學林出版社，1995。  
 季旭昇，《說文新證》(下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  
 阮元校刻本《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  
 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

-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中華書局影印清道光年間祈禱藻刻本,1987。  
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1988。  
曾運乾,《音韻學講義》,中華書局,1996。  
高亨,《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中華書局,1984。  
孫詒讓,《周禮正義》,中華書局,1987。  
董作賓,《董作賓先生全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夏含夷,《古史異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1974。  
黃玉順,《易經古歌考釋》,巴蜀書社,1995。  
李鏡池,《周易探源》,中華書局,1978。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

### <Abstract>

In the ancient literature, the statements about Gua(卦) and Zhao(兆) frequently be called “Zhou(繇)”. About the reason of the name,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it is connected to the letter “Yao(謠)”, and others consider it is connected to the character “Zhou(籀)”. “Zhou(繇)” is the designed said for the concept of trigrams and omens according to the fact that character “Zhou(繇)” arose in “bronze inscriptions”(金文)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moreover, “Yao(謠)” and “Zhou(繇)” had been applied separately in the literature before Qin Dynasty, and character “Zhou(籀)” arose relatively late. The name of “Zhou(繇)” is originated from “Du(讀)”; “Zhou(籀)” appeared later, which is refer to the book that historiographers taught the students. “Zhou(籀)” sounds similar to “Du(讀)” and their meanings are same. “Zhou(繇)” and “Zhou(籀)”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 they were mixed in the literature probably. The

connotation of “Zhou(繇)”, which is also called “Song(頌)”, is accumulated in the long term. Its language form is similar to poem. This phenomenon is related to the ritual of divination and the mode of spreading, which needs further researches.

Key Words : zhou(繇), ZhaoCi(兆辭), Zhou(籀), Song(頌), Du(讀)

